

Selected Works Of  
Chen Chuanxi



2



陈传席 著

陈  
传  
席  
文  
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

陈传席文集

Selected Works Of  
Chen Chuanxi



陈传席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传席文集 / 陈传席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153-4754-7

I. ①陈… II. ①陈… III. ①中国历史-文集  
IV. ①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4509号

选题策划: 彭明榜  
责任编辑: 孙梦云+彭慧芝  
书籍设计: 孙初+林业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http://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57350506  
门市部电话: (010) 57350370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10mm×1000mm 1/16 124.75印张 1729千字  
2017年9月北京第1版 201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 390.00元(全5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37

## 目录 contents

### ●第二卷 古代艺术史研究

#### 【汉唐五代时代】

- 一、佛教艺术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及其他 / 002
- 二、中国早期的佛教美术和四次样式演变 / 013
- 三、论故宫所藏几幅宫苑图的创作背景、作者和在画史上的重大意义 / 028
- 四、六朝后期至中唐山水画发展概说 / 040
- 五、“山水之变，始于吴，成于二李”——澄清唐代山水画史上的一个问题 / 054
- 六、王维和水墨山水画研究 / 064
  - (一) 王维的生平和思想评述
  - (二) 王维的山水画
  - (三) 王维在山水画史上的地位
- 七、国色天香——牡丹考兼论花鸟画的起源 / 082
- 八、佛教绘画何时传入中国？对中国绘画有何影响？ / 093
- 九、逸品美学观的确立及影响 / 097

## 【宋辽时代】

- 一、庆陵辽画及辽国两种形制绘画初探 / 106
- 二、论北宋中、后期山水画 / 115
- 三、王维传派中的李成、郭熙、王诜画系 / 136
- 四、《雪景寒林图》应是范宽作品 / 162
- 五、米友仁生卒年新考 / 167
- 六、《宣和画谱》作者考及其他 / 171
- 七、李唐研究 / 177
  - 第一章 李唐研究中一些问题之辩证 / 180
    - 第一节 对历来关于李唐生卒年考证的批评
    - 第二节 关于日本学者铃木敬的结论
    - 第三节 考南宋画院复置于绍兴十六年之后及李唐生卒年
    - 第四节 其他
  - 第二章 李唐南渡之新发现及李唐思想之分析 / 193
    - 第一节 李唐被掳后从金营中逃出
    - 第二节 李唐思想管窥
  - 第三章 李唐的生活道路 / 199
  - 第四章 李唐的作品 / 203
    - 第一节 李唐的人物画
    - 第二节 李唐的花鸟画
    - 第三节 李唐的山水画（上）
    - 第四节 李唐的山水画（下）
  - 第五章 李唐的崇古和独创以及南宋山水画“系无旁出”析 / 221
    - 第一节 李唐的崇古

第二节 李唐的独创

第三节 南宋山水画“系无旁出”析

第六章 李唐艺术风格形成之分析 / 231

第七章 李唐绘画成就和影响 / 236

第八章 李唐的两幅画 / 244

第一节 《晋文公复国图》

附录：《左传·秦纳晋文公》及注译

第二节 《采薇图》

附录：《史记·伯夷列传》及注译

第九章 论李唐的南渡、复院及其风格变迁（上）/264

（日）铃木敬著 陈传席译

第一节 迄今为止的研究经过

第二节 有关李唐的文献

第三节 金对开封的占领及画院和绘画遗品的去向

第四节 关于太尉邵宏渊

第十章 论李唐的南渡、复院及其风格变迁（下）/286

（日）铃木敬著 陈传席译

第五节 前稿（上）记述的若干补订

第六节 郭熙古典风格的解体和《松风图》

第七节 从《万壑松风图轴》到《江山小景图卷》和《奇峰万木图》册页

第八节 《晋文公复国图卷》和《采薇图卷》

第九节 关于“高桐院山水图”双幅

第十节 结语

附录：关于李唐研究的古代文献资料辑录

陈传席文集  
Selected Works Of Chen Chuanxi

第二卷  
古代艺术史研究



汉唐五代时代



## 一、佛教艺术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及其他

**【提要】** 佛像是佛教艺术的重要内容，佛教又称“像教”，因此，佛像传入中国才算佛教传入中国。几乎所有研究家都断定：佛像在印度出现不会早于公元七十八年。因此传入中国也必晚于此。证据是：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在公元78年前一直轻毁佛法，公元七十八年后才崇信佛，因此，在此之前不可能有佛像。本文首先推翻这一结论。因为研究家们都肯定了迦腻色迦王受当地希腊文化影响而造佛像，但希腊人在公元前二世纪初已统治印度的西北部，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原居住在中国西部的大月氏族人又进攻并占领了印度的西北部，建立了贵霜王朝，并定都于犍陀罗。原来的统治者希腊人反成为被统治者。到了迦腻色迦王时，希腊文化已在此流传了二百多年。希腊文化中早于公元前四世纪就有成熟的神像雕刻，希腊人崇信佛，要雕刻佛像，在他们统治印度时便可雕刻，又何必在经过了一百多年后自己成为被统治者才开始雕刻呢？而贵霜王朝原不信佛，会毁掉他们的佛像也有可能。但贵霜王朝后来信佛，正是借鉴甚至利用希腊文化制造了佛像，正说明希腊人早就有了佛像。因此，说公元七十八年后迦腻色迦王朝时期提倡信佛才有佛像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中国史学家一向有严谨笃实的学风，因而各种史籍记载都值得重视。作者查阅大量史料，并一一分析，得出结论是：佛像传入中国至迟



在汉明帝永乐八年，即公元六十五年之前，在民间则更早。

佛像是佛教艺术的重要内容，佛像传入中国的时间和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是相同的。若以因果对待来看，应该说首先是佛教艺术传入中国，才标志着佛教传入中国。佛教又称“像教”，是以艺术形象宣扬宗教作用的，所以，沈约在《积园寺刹下石记》中说“佛教东流”<sup>①</sup>，又在《佛序记》中说“又像教云”<sup>②</sup>，昙影在《中论序》中说“像教之中，人根肤浅”<sup>③</sup>。佛教和像教是一回事，所以两个词也可以互用。像教又叫像法，即以形像宣传佛法。一般人相信佛教也都从崇拜佛像开始，佛教兴盛，也就是佛寺、石窟寺的兴盛，寺中最重要的内容便是佛像，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佛教史离不开佛教艺术史，而且主要依靠佛教艺术史<sup>④</sup>。从历代佛教艺术中方可见到当时佛教的真实内容，从佛教艺术发展的状况中基本上可以看到佛教发展的状况。可惜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一些佛教史著作大都是佛教思想史，甚至只是佛学思想史。崇拜佛学的人数远不及崇拜像教的人数的万分之一，甚至连佛教徒也不太通佛学。因而研究佛教史的学者必须进入佛教艺术史的领域。基于此，佛经传入中国只能算是佛学传入中国。只有佛教艺术（佛像）传入中国并发生作用时，才算得上佛教传入中国。所以严格地说，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以后，佛教才传入中国。《法显传·陀历国》有云：“众僧问法显：‘佛法东过，其始可知耶？’显云：‘访问彼土人……大教宣流，始自此像。’”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三亦云：“自有此像，法流东派。”可见，佛教徒们自古以来也是这样认识的。

所以，时下很多著作中说到：“汉明帝遣使西行，在大月氏抄回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中，佛教于是传入人汉地。”（所有佛教内

① 见《广弘明集》卷十六。

② 见《广弘明集》卷十五。

③ 见《全宋文》卷六十三。

④ 佛教艺术的研究比佛教的研究多了一层艺术风格的研究。但很多佛教艺术风格的研究也属于佛教研究的范畴。如犍陀罗和秣菟罗风格的影响也就是印度南北方佛教的影响。

容的书中都作如是说，故不必注明某一具体书名。)抄回佛经四十二章，只能说是佛学传入汉地，而不能说佛教传入汉地。

或曰：释迦在世时，亦没有佛像，更无崇拜之事，不就有佛教了吗？其实最早的“佛教”和后来的“像教”性质完全不同，释迦在世时，也曾度人为僧，佛学家们称之为“最初的僧团”，在原始佛教经典《阿含经》以及律藏当中也提到这些问题，但并无崇拜之事。释迦只是向他们宣传自己的学说，学说和宗教不同。释迦早期的所谓传教实际上都是宣传自己的学说。至释迦死后二百年间，佛教史上称之为“原始佛教时期”。“原始佛教时期”的人们也没有把释迦当作神去崇拜，因之，也和后来的佛教性质不同。当然，对释迦尊重性质的崇拜还是有的，例如供养他的遗骨（舍利），而这仍然是对“人”的崇拜。

释迦死后，他的大弟子摩诃迦叶、阿难等率五百弟子会集在王舍



东汉 佛坐像

四川乐山麻浩崖墓堂亭堂门楣，红砂岩，高39cm，宽30cm。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此像是有明确纪年的东汉晚期作品。

城，对释迦一生的说教进行回忆，修正补充，确定教典，史称第一次结集。这第一次结集，实际上并没有形成文字，只是师徒之间口头传承，而且内容也不过是教法、戒律等。释迦自己没有把自己视为神，他的传世弟子也没有把他视为神。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释迦说法等内容，乃是他死后二百余年，佛徒们假以记录整理为名，重新创造甚至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内容。尤其是五百条“本生故事”，说释迦生前给弟子们讲自己前生作鹿、作熊、作獐、作兔、作鱼等等，还有“舍身饲虎”“割肉贸鸽”等等，作无数代修菩萨行的转生，才成为佛。释迦是道德品质十分高尚的人，相信他不会讲这些话。所谓释迦说，实

实际上都是后世崇拜者编造的。后世所相信的正是这些假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并非释迦牟尼所创，而是释迦的再传弟子和崇拜者（利用者）们所创。所以，释迦和孔子不同，释迦生前并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他说法的内容可以看作是他的学说，但只在当时和稍后有些影响，后来便被人改变了。尔后的佛经和释迦基本无关，至少佛经并非释迦的著作。孔子则生前便有文字留下来，《论语》一书也是他的弟子根据他的讲话真实内容所作的记录。孔子死后，其学说一直延续至今，从未中断。孔子的真实学说流传世界各地，供人学习，释迦却没有。但释迦的像却流传世界各地，供人崇拜，尤以中国的佛像最多，但这像也未必是释迦的真实形象。

就考古发现而论，连云港孔望山东汉佛像石刻、四川彭山东汉崖墓陶制摇钱树座下一佛二菩萨和乐山麻浩、柿子湾两窟东汉崖墓内的三身石刻佛像为至今发现最早的佛像，一般说来，这些佛像均在东汉末年。在有明确记年的佛像中，以湖北武昌莲溪寺的菩萨形造像为最早，在吴永安五年（262年）。当然，考古发现，只能证明它本身的时代，不能说明就是最早出现的时代。犹如从地下挖掘出来清乾隆年间的钱币，并不能证明钱币就起于清代。佛像在印度，至迟也在迦腻色迦王朝时代已大量存在，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但实际上却早于此（详下），而目前考古的发现却皆晚于此。所以无论在中国抑或是印度，都会有大量佛像实物，或者尚未被挖掘出来，或者早已毁坏。

但考古中发现东汉已有大量的佛像出现，且各地有各地的特色，长江下游多出现于丧葬、魂瓶之上，四川地区多出现于摇钱树上，连云港等地，佛又和道、神仙等相联合。这说明：一、东汉之前已有大量佛像传入中国；二、传入的道路非止一端；三、佛像的传入和当地的民俗相结合，人们只把佛当作神的一种，而且都是希望从佛身上得到钱和其他利益，这恰恰是违背佛教的初衷的；四、早期的佛像、佛教并非出自朝廷，至少不完全出自朝廷，而多是出自民间。因此，研究佛教的出现和流传就不能仅以官方文献为准则。

在研究佛像传入中国的最早时间之前，还要先弄清佛像在印度出现的最早时间。一般研究者都认为，佛像在印度的出现不会早于公元七十八年。证据是：贵霜王朝第二代国王阎膏珍还是个婆罗门，到第三代国王迦腻色迦才崇信佛教，兴建寺塔，允许民众礼拜佛；又因犍陀罗地区长期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希腊人原有崇拜神像的传统，并根据希腊人崇拜神而雕塑或绘画佛像，从此才产生了佛像。结论是：佛像在迦腻色迦在位时即公元七十八年以后才首次出现，而且不包括色迦初登王位时期，因为那时色迦王“不信罪福，轻毁佛法”（见《大唐西域记》卷二48页）。所以在此之前是没有佛像的。

如果说在贵霜王朝中，官方准许拜佛像是在公元七十八年以后，这个推论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说佛像最早也产生于此时，则绝对不能成立。

众所周知，印度的佛教艺术始兴于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公元前273~前232年）。但这时期却没有佛像，只有一些佛的足迹、佛发、法轮、伞盖、宝座或菩提树等雕刻品之类，供崇拜者礼拜。这个时期在民间是否有佛像，我尚不敢提出怀疑，但传说中已有（见《增一阿含经》卷28），大月氏人兴建寺塔，崇拜佛，正是效法阿育王的，而造佛像却是效法希腊人的。且说公元前四世纪（前327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帝率领希腊军队入侵印度，在印度西北地区建立两个殖民地的省。当孔雀王朝建立后，开始驱逐希腊人，到了阿育王（前273~前232年）时，统一了全印度，阿育王是保护佛教的国王，但阿育王死后不久，印度又一次陷入分裂局面。公元前二世纪初，希腊人再次征服了西北印度，并建立大夏国统治这一地区。据史书和现存的碑文记载，在印度西北的希腊人都是崇信佛教的。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原居住在中国西部今甘肃省敦煌地区以及祁连山一带的大月氏人，又进攻并占领了印度西北部，建立了贵霜王朝，并定都犍陀罗，原来在这一地区的希腊人反而成为被统治者（整个大夏国和其他一些希腊式的城市都被大月氏人并吞并统治）。但到了迦腻色迦王（约公元78~120年）时代，希腊文化已在此地流行了两个多世纪。目前学术界公认的一个事实是：佛像的产生是

希腊人根据希腊文化的创造，并不是贵霜王朝的大月氏人文化的传统，大月氏人只是受希腊文化传统的影响而已。这问题已经很清楚，如果说在贵霜王朝中（不包括被其统治的地区和人民）迦腻色迦初期之前无佛像，我是赞同的。如果说在这个王朝之外，以及在整个印度色迦王朝之前也没有佛像出现，则完全没有根据。犹如美国人在鸦片战争中入侵中国时方学会一些汉字，因而由此断定中国的汉字产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其荒唐程度不言而喻。我的结论恰恰相反：迦腻色迦王朝在准许拜佛时便借鉴甚至利用希腊文化制造出了佛像，正说明希腊人早有佛像存在。希腊人崇敬神，希望得到神的保佑，因而雕刻、绘画神像，到了印度又崇敬佛，希望得到佛保佑，在他们心中，没有佛像，便无法崇拜佛，便无法得到佛的保佑，这是希腊人的传统。希腊文化兴起于公元前八世纪前后，大盛于公元前四世纪。那时候就有十分成熟的神像雕刻。希腊人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就统治了印度的西北地区，难道说，这个时期他们就不会雕刻、绘画佛像，而要等到大月氏人来到之后，自己变成被统治者时才想起雕造绘画佛像？从另一方面考察，希腊人如果不是很早就造出佛像来，恐怕大月氏人还想不到崇拜佛像。当然，不容否认的是，迦腻色迦时期，王朝的提倡，佛教势力更大，佛像更多，当是事实。但决不能说佛像起源于此时。从任何一方面考察，佛像始创于迦腻色迦时期都是不能成立的。中国人谈到自己的历史时，也常说秦始皇筑长城、蔡伦造纸等等，实际上，长城的主体是秦始皇以前很早就筑成的，秦始皇不过是连接而已，纸张在蔡伦之前就出现了，蔡伦只是发展而已。迦腻色迦造佛像类此。

我的推断，希腊人早期造佛像，根据荷马以来的“神人同形同性”说，造成了完全的希腊人形象。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形象的佛才能保佑他们希腊人。但印度人却不承认这是印度的佛。而大月氏人的形象却基本上和印度人接近，他们要求佛的形象接近大月氏人（或当地人）。因而迦腻色迦时期佛像的形象出现了变化：其一是仍有一部分希腊艺术家的造像完全延续希腊式；其二是希腊和大月氏的混和式；其三是大月氏



式；其四是印度式（形象类于秣菟罗式，但风格不同）。于是各种人都承认有自己的佛像存在。

我的推断是有根据的。早期佛像中，北路传至我国的云冈石窟佛像，方而直的鼻子从额直下，完全是希腊式，而不是印度式。相反，现藏印度和英国伦敦等地的犍陀罗式佛像（早于云冈石窟），希腊式特点却远不及云冈佛像典型。而有的犍陀罗佛像，就形象而论，基本上是大月氏式，有的兼有希腊和大月氏二式，有的形象和秣菟罗式并无区别（非指风格），所以，我们可以找出一些早期佛像中希腊式雕刻的典型。但把所有佛像都摆出来，并不都是典型的，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

佛像的兴起，影响所至，连秣菟罗地区也由先前崇拜佛的脚印等改为崇拜佛像了，但都是在希腊人造佛像之后。以上我作了烦琐的说明还是有必要的，否则学术界便会以印度佛像的出现年代之不正确结论，来否认中国文献的记载。因为中国文献记载：佛像在公元七十八年前早已传入中国（汉地）。事实上，中外学者都认为：因为佛像在印度的出现是公元七十八年之后的事，所以在此之前传入中国的记载都是错误的。仅用这一句话便否认了中国所有的文献记载。我们破除了学术界的成见之后再来看中国文献，反而更能加强这一观点。

就记载而论，《魏略·西戎传》载：“临儿国，《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头邪，母云莫邪。浮屠身服色黄，发青如青丝，乳青毛，岭赤如铜。始莫邪梦白象而孕，及生，从母左肋出，生而有结，堕地能行七步。此国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别号，合有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sup>①</sup>

<sup>①</sup>转引自《三国志》卷三十《魏书》第859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这一段文字在《世说新语·文学》“殷中军见《佛经》条”中刘孝标注也有，《魏略·西戎传》曰：“天竺城中有临儿国。”云云，其中博士弟子叫“景虑”，“复立”作“复豆”。这一段记载还有问题，比如大月氏人当时是否信佛，笔者尚缺乏研究。因为文中说的是“大月氏王使”而不是其他。有很多文献上记载，大月氏人一直崇信佛法，《大唐西域记》又说贵霜王朝第三代王初期还“轻毁佛法”。汉哀帝元寿元年是公元前二年，如按《大唐西域记》的说法，这时的贵霜王朝还是不信佛的。“大月氏王使”应该是代表贵霜王朝的，如果“大月氏王使”不是代表王朝，而代表大月氏族中一股信佛的势力，那么，这句话就没有问题了。

然即使“口授《浮屠经》”之类可信，也不过是中国人知佛经之始，未可言佛教传入中国也。《魏书·释老志》中也有同样一段记载，但加了一句“中土闻之，未之信也”，可见是无影响的。在此之前，也有佛像传入的记载，但皆不确切。《魏书·释老志》云：“案汉武帝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sup>①</sup>元狩中在公元前122至前117年之间，从来降的匈奴人中得到金人，《魏书》的作者认为“此则佛教流通之渐也”<sup>②</sup>。但这只是偶然获得一像，且并不知是佛，更无影响。不过也说明佛在我国的西域已有流传。

正式记载佛、佛经、佛教艺术传入中国的文献是《后汉书》，其云：“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sup>③</sup>这一记载比较真切，佛像

① 见《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十》，第3025页，中华书局版。

② 同上。

③ 见《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2922页，中华书局排印。按《后汉书》这一记载来源于袁宏的《汉记》，参见该书卷四十二《楚王英传》注，同书第1429页。

的高度、颜色、光圈（顶有光明）都清清楚楚。而且传入后就在中国产生了影响，从明帝、楚王英到桓帝至百姓，信佛的人逐渐转盛。

《后汉书》的记载是有来源的，东汉时的《四十二章经序》云：“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顶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騫、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氏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竖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胜数。”《牟子理惑论》也是东汉的著作，其说与之相似：

问曰：汉地始闻佛道其所从出耶？

牟子曰：“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人？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氏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明帝存时，预修寿陵曰显节，亦于其上作佛图像。时国丰民宁，远夷慕义，学者由此而滋。

东晋史学家袁宏（328~376年）在其所著的《后汉纪》卷十中又把此条附于“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中：

初，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象焉。

《后汉书》中所说的“世传”就是据以上所记。不论所记所传的具体情节是否可靠，但汉明帝时佛像已传入中国，而且已由先前仅在西域流传而正式传进宫廷，是可信的，而且《后汉书·楚王英传》还记：

“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由是可知，明帝只是请来佛像



并加以传播，楚王刘英（？～71年）始为斋戒祭祀等形式，他还施舍黄绢白纨给佛寺，并“诏令天下死罪皆人缣赎”<sup>①</sup>。这大概也是施舍财富给沙门以赎己罪的形式之始，由是亦可见当时官方对佛教已不生疏了。

尔后，南齐王琰的《冥祥记》的同类记载中又增加了迦叶摩腾的名字：

汉明帝梦见神人，形垂二丈，身黄金色，顶佩日光，以问群臣。或对曰：“西方有神，其号曰佛，形如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发使天竺，写致经像，表之中夏。自天子王侯咸敬事之，闻人死精神不灭，莫不惧然自失。初使者蔡愔将西域沙门迦叶摩腾等，赉优填王画释迦倚像。帝重之，如梦所见也。乃遣画工图之数本于南宮清凉台及高阳门显节寿陵上供养。又于白马寺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之像如诸传备载（《法苑珠林》卷十三）。

《魏书·释老志》所记又将迦叶摩腾等改为摄摩腾、竺法兰二人，其云：

孝明帝夜梦金人，顶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情乃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藏于兰台石室。情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阳城雍门西。<sup>②</sup>

据《高僧传》记载，摄摩腾、竺法兰是中天竺人。关于明帝夜梦金人而后使人去天竺取经及佛像事，记载的文献颇多，历来统治者喜故弄玄虚，借以骗人，大约明帝听到了一些佛的消息，为了宣扬自己的神圣性，或认为佛可利用，便诈言梦云，于是派人去天竺取经，同时带来了释迦像，这样，佛经和佛教艺术便同时正式地由官方传入了中

<sup>①</sup>参见《后汉书》卷四十二《楚王英传》，中华书局排印本，第1428页。

<sup>②</sup>《魏书》卷一百一十四，第3025—3026页，中华书局排印本。